

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书系
明生◎主编



徐文明◎著

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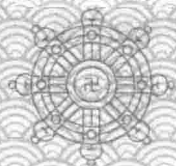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出版

20107

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书系

明生◎主编



徐文明◎著

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之



羊城晚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 徐文明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543-0258-3

I. ①广… II. ①徐… III. ①佛教—关系—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广东省 IV. ①B948 ②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5577号

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Guangdong Fojiao Yu Haishang Sichou Zhilu

策划编辑 朱复融

责任编辑 朱复融 黄捷生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校对 杨 群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13B
邮编: 510665)

网址: 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50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258-3/B·45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广东号称岭海，北倚五岭，南临南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而省会广州状如大舶，表明广东与海洋及海洋文化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广东省实为中国大陆首屈一指的海洋大省。

自汉武帝以来，南海一道一直是海外诸国遣使贡献的要道，也是海上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道。胡商越贾，张帆往来；闽船浙舶，满载而至。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繁荣的贸易，发达的商业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互通与友好往来。

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佛教传播的重要路线。西竺梵僧，蹈海而至；东国行者，踏波远航。传法译经僧，求法访道僧，共同带来了海外先进的印度佛教与文化，促成了广东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传禅弘律僧，求道习禅僧，一起带去了中国发达的佛教与禅律文化，将广东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精华传播到三韩、日本与越南等地。

广东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创始、生存与发展繁荣和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广东佛教的特质体现出浓厚的海派精神与南宗风范，广东佛教堪称中国海洋佛教的代表。不研究海洋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就不能充分理解广东佛教的本质与特色。

发展“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策，振兴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广东的责任。天台智者大师主张佛教徒要爱教、爱国、爱众生，爱国更是广东佛教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明清之际的遗民僧便是这一传统的优秀代表。为了配合国家战略，为了振兴广

东佛教，理应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建设事业之中。

光孝寺作为岭南首刹，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与枢纽，其创始人昙摩耶舍便是泛海而来的印度高僧和大禅师，其后有菩提达摩、真谛、义净、不空、鉴真等无数高僧由此往来海上，传播佛法。因此，光孝寺更有责任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佛教的研究与建设。

山僧与本书作者徐文明教授相识有年，深知他对禅宗与岭南佛教素有研究，长期参与并支持广东佛教的理论建设和学术研讨，是写作本书的最佳人选。去年岁末一晤，面邀其写作本书，徐教授欣然应允。时间紧，任务重，徐教授不辞辛苦，夙兴夜寐，按期完成了此书。

本书是从海洋佛教及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新的视角对于广东佛教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与梳理，涉猎广泛，勾画细致，举重若轻，新意迭出，为这一方面的开创之作。期待进一步加强与徐教授的合作，使其在岭南佛教研究领域有更多的学术著作问世。

本书亮点之一，便是有关越南佛教部分。众所周知，交广古来一体，广东佛教与安南佛教相互交流、长期共存、唇齿相依、密不可分。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与越南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加强两地佛教的相互交流，化干戈为玉帛，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值此新书付梓之际，特应作者之邀，聊缀数语，言不尽意，姑为之序。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
明生

2015年11月广州

前言

preface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背靠五岭，面向南海，构成了岭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温暖而又湿润，水网交错，物产丰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形成美丽而又浪漫的南方风情。

岭南地区呈现了少见的对内相对封闭、对外开放的状态，巍峨的五岭挡住了来自北方的风沙，也延缓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向南渗透的步伐，因而这里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成为流放与贬谪的首选地区之一。另一方面，长达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丰富的海洋资源，又使这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核心地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窗口。

由于远离中原及国家政治中心，这里一向被视为化外之地，成为文化与礼仪的孤岛，长期受到北方的蔑视，呈现出落后的南蛮形象。然而这里很早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对外交流一直延续不断，先进的外来文化最早在这里登陆，然后传到中国各地。

这种对内相对封闭而落后、对外开放而先进的奇特现象恐怕在中国是绝无仅有，这决定了岭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的独特风貌。

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南传是一种阻碍，对于外来文化的引入反而是优势，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本土文化的阻挠，外来文化更加容易引入并植根发展，佛教恰恰就是这么一种外来文化。

从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角度来讲，这里长期处

在落后状态，直到明朝，才出现了陈献章这么一位大儒，而从佛教来讲，岭南佛教基本上与中原佛教同步，某些宗派甚至出现得更早。这种现象，当然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第二章第二节），比印度佛教更早传入中国。那么佛教最初是经哪条路线传入中国，是陆路优先还是海路更早，一直是梁启超等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至今没有定论、仍在热烈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同时还是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是学术界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口授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的大月氏使者伊存固然是从陆路来到长安的，但这种传入只是逻辑意义上的始点，并未由此产生广泛的影响。楚王英信佛表明东汉初年佛教就已经在中国比较广泛地传播了，明帝求法肯定在此之后，其意义不是佛教开始传入，而是中国官方认识到佛教的重要性，特意派遣使臣主动到天竺求法。那么楚王英究竟是因何机缘而信仰佛教，其信仰是源自京城洛阳还是其封地江淮徐州一带，成为海陆何者优先的关键。

靠近东海的楚王英封地恰恰是海陆交通的枢纽，可以说二者皆有可能，然而楚王英的信仰不始于早年而在晚年，表明移居江淮才是他信佛的转折点，而这里受到海上丝绸之路影响的可能性更大。至少不能排除海路的影响，连云港孔望山等地的佛教造像或许可以作为这里佛教流行很早的证据之一。

安世高被公认为中国佛教最早的译经大师，其生平事迹中包含了大量的传说甚至神话，而这些传说多数都与江南有关，反而未提他在洛阳译经的史实，尤其强调他到过广州乃至两次来此，这些说法至少表明一个事实，即他与岭南广州有不解之缘。两世降临神话色彩过于浓厚，更有可能是两次到此，最初跨海来游，为少年所误伤，几死，四十年后晚年再至，当时的少年，已成六十老者。

支娄迦讫来华稍晚，其时北方交通几乎断绝，天竺两次贡献，都是经海路，史有明载。这表明支讫、佛朔来华，亦有可能经海路，汤用彤先生隐有此意。其时南海人子碧参与二人译经，表明佛教初传之时，已有未开化地区的南海人成为居士。

这些都表明，佛教初传之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也证明岭南佛教基本上是与中原佛教同步进行的。中国佛教第一部著作《牟子理惑论》在交州的诞生突显了交广佛教在初期的突出地位，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最早试验。可怪的是，作为广东本地学者、极力倡导海路优先的梁任公却不肯

承认《牟子理惑论》，反而对之极力贬低，视为晋后伪作。

作为安世高之法孙，康僧会成为交州佛教毫无争议的代表人物，他后来北上江东传法，成为南方佛教的领袖和当时中国佛教的最高权威之一。不论是色身还是法身，康僧会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没有海上贸易，他的父亲就不会来到交趾，当然他就不复存在了；没有海陆佛教在交州的交汇，他就无法以本土出生出家的佛教代表身份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与权威。

总之，通过考察佛教初传时期的情况，可以得出当时文化落后的交广岭南地区在佛教方面反而处于领先地位的结论。正是由于儒家与道家在这里相对弱势，才使佛教有了与两家平等对话与交流融合的可能，这里成为三教合一最早的样板和试验田，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这种意义之大还没得到足够的认识。

历数岭南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的巨大影响。天竺等地的外来僧人多数由此登陆，还包括以义净为杰出代表的西行求法的归国僧人，求法高僧多数由此离岸，这里是印度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特别是广州光孝寺具有突出的地位。具体到佛教宗派，中国禅宗毫无疑问由此发源，最早的禅宗大师如昙摩耶舍、菩提达摩等皆由此登陆，昙摩耶舍还被视为光孝寺的开创者。密宗传入同样与此地关系密切，金刚智、不空都多次经历广州，泛舶往来。

禅宗是岭南佛教中最为重要的宗派，禅学始终是这里的主流，这也是本地佛教的根本特征之一。六祖惠能大师在岭南的横空出世更是开创了禅宗的新纪元，标志着岭南佛教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甚至改变了外界对于岭南人的认识。其后石头希迁、西山惠照、潮州大颠、仰山慧寂、云门文偃等大师的相继弘化，使得本地禅宗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宋元之时，由于本地佛教人才外流严重，使得岭南佛教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代更加严重，明末憨山大师德清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势，使得本地佛教有了重振与中兴的势头。明清鼎改之际，曹洞宗在广东地区兴盛起来，出现了东江道独华首系与西江道丘鼎湖系并盛的局面，重现了两株嫩桂久昌昌的盛况，临济宗木陈道忞系也趋势崛起，并与鼎湖系合流。

正如狭义的广佛同城一样，更大范围的交广一体更是岭南佛教从始至终的状况。交广一体使得广东佛教与越南佛教从一开始就不可分割，后来一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越南成为岭南佛教向外传播的主要地区。中越两国同源一体，长期友好，特别是中国国亡家破、受到异族统治之时，越南接受很多中国遗民，中华文化在这里得以延续，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感谢越南人民的地方。越南佛教不同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而是汉传佛

教的一个重要支派。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状况，作者有意加强了对于越南佛教的学习与研究，吸收了有关越南佛教的研究成果。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岭南佛教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一是开放精神，这一地区一直是对外交流的门户，因此佛教也一向是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敞开大门、广泛吸收印中各派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从不固步自封、封闭保守。二是融合精神，广东佛教虽然以禅为主，但又兼收并蓄，百花齐放，融合了律、密、净、教各种宗派，熔内外、南北于一炉，还是三教结合的最早的典范。三是创造精神，佛教尤其是禅宗特别崇尚创造与创新，广东佛教更是如此，昙摩耶舍、菩提达摩所带来的禅宗给中国佛教注入了一场新风，六祖惠能开启了禅宗革命，以道独和道丘两系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曹洞宗开创了禅与儒结合的新篇章。四是爱国精神，这里一方面是国家南方边陲，一方面又是最后的屏障，特别是面临北方强敌入侵之时。无论是外敌入侵还是内寇扰乱，这里都表现出了坚强不屈的爱国精神，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许多士大夫避世逃禅，涌现出一批爱国高僧，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五是重商精神，与其他地区的佛教不同，这里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商业一直发达，因此商业经济是广东佛教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不是仅靠农业。广东佛教的产生依靠海上贸易，生存与发展也依靠海上丝绸之路，因此这里的佛教大师更加重视商业，强调与商人居士的密切关系。这方面在清代最为突出的典型便是石濂大汕，他被认为是在十三行出现之前就积极推动海外贸易并且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的重要人物，这在僧人中是开风气之先的。

将这五种特征总括起来，便是海洋精神与海派风格。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南方降雨多，江河多，是故南方文化多体现出亲水的精神，这在老子开创的道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广东佛教同样体现了南方佛教与海洋佛教的特色，这一方面继承了龙树一派大乘空宗与菩提达摩南天竺一乘宗的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本土南方乐水文化的特色。大海没有边际，是无限开放的；大海容纳众流，是无限包容的；大海灵动自如，法无定法，是充满创造与新意的；大海能行船舶，是开展贸易、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大海是爱国之士万不得已时流亡海外的唯一道路，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向海外传道的志愿，当中国亡国之时，许多不愿接受异族统治的爱国者冒险奔于海外，在异国他乡保存中华文化，保存有生力量，伺机打回国内。

面朝大海的岭南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为适宜的春天般的温暖环境，禅的花朵在这里灿烂绽放，使得广东佛教长期繁荣，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

总之，广东佛教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及海外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关系密切，透过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和研究广东佛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大工程。本书主要从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探讨广东佛教的发展历程，限于体例与篇幅，对于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没有展开有效的讨论。由于时间紧迫，学力不足，本书存在的问题不少，希望得到有缘方家的指点。仅以本书抛砖引玉，希望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讨论。

徐文明

2015年10月

目录

第一章 东汉三国时期交州佛教发展与海上传播路线 1

- 第一节 佛教初传及传播路线之争 1
- 第二节 安世高与佛教最初传入交广岭南地区 4
- 第三节 南海子碧与支娄迦谶、竺佛朔等译经..... 17
- 第四节 交州佛教与《牟子理惑论》 22
- 第五节 康僧会与三国时期交州佛教 34

第二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岭南佛教 39

- 第一节 两晋与南北朝初期广州译经活动 39
- 第二节 西僧东来与广州南海作为南朝佛教门户地位的确立 ... 47
- 第三节 登陆广州的第一位求法高僧法勇 55
- 第四节 内地僧人南下广州 62
- 第五节 比丘尼戒法传入岭南 71
- 第六节 岭南本地僧人的弘法业绩 75
- 第七节 真谛与南北朝末期岭南佛教的繁荣 79

第三章 禅宗经海路初传岭南 96

- 第一节 禅宗上代祖师与海洋佛教的关系 96
- 第二节 昙摩耶舍与禅宗初传岭南 99
- 第三节 佛陀跋陀罗经南海来华传授禅法 108
- 第四节 菩提达摩经南海来华 113
- 第五节 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与岭南禅宗传播海外安南 121

第四章 唐五代时期岭南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131

- 第一节 唐朝经南海来华的外国僧人 131
- 第二节 金刚智、不空开创的密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140
- 第三节 新罗惠超等经历南海求法 150
- 第四节 经历南海求法与传法的中国僧人 154
- 第五节 《楞严经》在广州的传译 161

第五章 唐五代时期岭南禅宗发展及海上传播 168

- 第一节 六祖惠能与禅宗南宗宗风 168
- 第二节 石头希迁禅派与滨海佛教 181
- 第三节 仰山慧寂及沩仰宗在岭南的弘化 200
- 第四节 无言通禅派传入安南 209
- 第五节 新罗僧人在岭南的求法与弘化 215
- 第六节 云门文偃及其门人在岭南的弘化 219

第六章 宋元明清时期岭南禅宗及其海外传播 222

- 第一节 宋代云门宗与越南草堂禅派 222
- 第二节 宋代临济宗与岭南佛教 224
- 第三节 憨山德清与临济宗在岭南的振兴 230
- 第四节 木陈道忞系与广东临济宗的扩展 233
- 第五节 明清时期临济宗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243
- 第六节 宗宝道独开创广东曹洞宗东江华首系 254
- 第七节 天然函昱生平禅法与中道精神 265
- 第八节 栖壑道丘、弘赞在粤与鼎湖山系的融通宗风 275
- 第九节 石濂大汕与岭南曹洞宗传播越南 284

附录一 293

第一章 东汉三国时期交州佛教发展与海上传播路线

第一节 佛教初传及传播路线之争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最初的传播路线是什么，这是学界讨论已久的问题。一般认为，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法东传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北方的陆路，一是南方的海路。那么哪条线路最早，或者说哪条线路更加重要，则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

传统的观点亦是至今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是佛教最初由北方陆路传入。梁启超最早提出佛教先由海上传入的观点，他指出：“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路，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¹对于这一观点，胡适和冯承钧等是赞同的。胡适也认为：“我深信佛教入中国远在汉明帝之前，我也深信佛教之来，不止陆路一条路，更重要的是海道，交州在后汉晚年已是佛教区域，所以佛教大概先由海道来，由交广到长江流域及东海滨，先流行于南方。”²

梁启超还指出，据《汉书·地理志》，从广东徐闻、合浦等出发，到达南洋、印度等地的商道早已开通，天竺、大秦等国贡献，皆遵海道，这“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帝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粤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蒔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³

1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陈士强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2 胡适：《致杨联升》，引自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7页。

3 《佛学研究十八篇》，第33页。



汉武帝平南粤后，特意开辟海上交通，一为扬国威，一为开展贸易，而民间的商道当然更早，可以说，在佛教产生之后，通过海道进入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佛教最初经海路传入，不一定是通过出家僧人，更有可能是通过具有佛教信仰的商人。佛教与商人关系之密切前人论之已多，而浮波万里、九死一生的海商，更需要通过坚定的信仰来增加信心，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信仰佛教，是合乎情理的。商人在远洋贸易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佛教信仰带入中国南海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由于此时岭南一带民智未开，没有能力充分理解和吸收这种先进的外来文化，因此即便有佛教信仰，也仅限于外来侨民商人和极少数先知先觉者，影响范围有限。由于汉武帝北迁粤民，南粤与江淮间相互交流增加，本来传播到岭南的佛教进而来到江淮，而江淮地区文化先进，黄老发达，更有能力理解和吸收佛教思想，因此佛教在这一地区繁荣起来，这是合乎情理的。总之，梁任公之说虽然显得证据不足，但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

佛教最初传入和路线与最早流行的地区，这两种说法交织在一起，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楚王英（？-71）。

据《后汉纪》卷十：

许姬生楚王英，号楚太后，无宠于世祖。英最小，自帝为太子时，英独归附上，上特亲爱之，数加赏赐。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八年，上临辟雍礼毕，诏天下死罪得以缣赎。英遣郎中令诣彭城，曰：“臣托在藩蔽，无以率先天下，过恶素积，喜闻大恩，谨上黄缣二十五匹、白纨五匹，以赎其愆。”楚相以闻。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齐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因还其赎。男子燕广告英与颜忠、王平等造图书谋反，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请诛。上以至亲不忍，徙丹阳泾县，汤沐邑五百户。英男子为公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留楚宫。婢才人鼓吹从英者无限，皆乘輜辇，带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欢娱。遣大鸿胪持节护送英丹阳。¹

楚王英是中国最早知名的佛教徒，对此并无疑问。那么，他的佛教信仰究竟来自何处，是来自江淮本地还是洛阳，是南传还是北传？梁任公认为肯定出自南传，汤用彤先生则不认同，他指出：

1 张烈校点：《两汉纪（全二册）》，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186—187页。

夫楚王英因为信佛最早而最显著之人。然观于其建武二十八年始就国，而其兄弟中又多交方士。其染佛化，任公谓其必不自洛阳，其不可通一也。¹

如果依汤先生之说，则楚王英之染佛化，是在未就国之前，则早在建武二十八年（52）前，洛阳就已经盛行佛教了。此说的证据恐怕也不充足，如果光武帝时京师佛法甚盛，为什么只有楚王英一人成为佛教徒，其他交方士的诸王未闻有明确的佛教信仰呢？汤先生认同的《牟子理惑论》称汉末之时洛阳儒林之中“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也”，表明直到汉末，佛教信仰在京城仍未盛行。

此外，史载楚王英初好游侠，晚节喜黄老浮屠，表明他在京城时是一个喜欢游侠武术的少年王子，就国之后才开始受当地文化影响信仰佛教，因此他的佛教信仰肯定不是始于洛阳，梁任公之说并无错误，倒是汤先生没有留意到史传所载楚王英“晚节”好黄老浮屠的细节。

楚王英时，一方面修建了浮屠仁祠（佛寺），一方面已经有“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可见当时有为数不少的专门出家的沙门和在家居士，楚王英常广开斋会以供养出家沙门，并有很多居士参与。在“仁祠”之中，或许已经有了涂金佛像。因此，当地的佛教事实上相当完备发达，这显然并非朝夕之功。

楚王英治下的江淮徐州一带，是东汉佛教最为发达的地区，并且一直延续下来，后来又有笮融于此大兴佛法。那么，这一地区的佛教究竟从何处输入呢？其实汤先生也不否认佛法由海上输入，只是不认同任公最早始自海道说。依据现在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主张此地来自北传还是占大多数。因此，不妨折中一下，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仰应当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北方陆路，一是经由南方海上。由于海路输入证据实物不如陆地方便保存，因此留下的证据肯定没有陆路多，这也不能作为海上输入远远不及陆路的充分证据。

另外，梁任公反对明帝求法之说，一是因为楚王英早在永平八年（65）前就是佛教徒，明帝诏书褒之，对于佛教肯定早就有所了解，佛教传入自然在此之前，不待明帝求之，二是因为相关的说法前后不一，矛盾之处不少。然而据实论之，明帝求法不可轻易否定。在明帝之前固然已有佛法，但是由外来桑门和信佛的外国商人传入，明帝求法则则是汉朝主动派人到月氏、天竺等佛教流行地区求取经像，主动吸收和学习佛教文化。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第60页。



明帝求法可能还与楚王英有关。英为明帝之幼弟，幼时便主动亲附时为太子的明帝，对之坚决支持，是故明帝对其很喜爱，即位之后，每加赏赐，益其封邑。所谓楚王谋反，虽是有人告发，恐怕属于误会，是故明帝并不深究，依然优待。楚王英于十三年（70）十二月“谋反”，有司欲诛之，明帝不肯，只是降级移封丹阳泾县，从者数千，待遇不减，不料十四年（71）四月楚王竟然自杀，或是出于自证清白，或是表明佛教徒并不畏死。此事给明帝很大的刺激，永平十五年（72）春二月庚子，行幸彭城，止楚王馆，思念楚王，悲恸不已，左右百官凄然。所谓明帝夜梦金人，很可能是他在楚王馆中见到了涂金佛像，后来回到洛阳，因思念楚王，梦中又见金人，此事可能激发了他对佛教的强烈兴趣。永平十六年（73），因为匈奴犯河西，明帝下决心遣将讨伐，恢复西域故地，由此西道复通，其遣使求法，当在此时。明帝本人或因受楚王影响部分接受佛法，故《牟子理惑论》载其预作寿陵显节，于其上作佛图像，并写佛经四十二章，大起佛寺。

明帝求法是中国官方首次向外求取佛法，也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具备了合法性，对于佛教东传和发展壮大影响极大，因此得到后世佛教徒的普遍认同。

第二节 安世高与佛教最初传入交广岭南地区

佛教传播与商业往来是密不可分的，自古以来，无数的商船穿过狭长的马六甲海峡，往来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形成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的南海到中国的南海，一批又一批舍身为道的僧人搭乘商船，往来于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形成了一条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精神纽带，印度洋季风更是把清凉的佛法传播到中国南海，传到广东。

据《晋书》十五：

交州。按《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峽。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后使任嚣、赵他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